

## 批評與回應

# 「閱讀西方」：為何又要「重新」？ ——與甘陽、劉小楓二先生商榷

● 吳冠軍

### 一 「博客」時代，還是「狂客」時代？

在今天所謂的「博客」時代，我們一次次碰到這樣的笑話：某人突然在網絡上宣布，前人的思想(或以前的研究)全是錯的，而他／她提出了真正的思想體系。對於網絡時代那一個個不甘「潛水」而急於冒出水面的「狂客」，我想人們大都是一笑置之。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由甘陽、劉小楓二先生聯合撰寫的〈重新閱讀西方〉一文，或許才真正地逼使我們不得不認真地對那動輒宣布「多少年來前人研究皆錯」的「狂客」話語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邏輯，作一個批判性的檢討。

在當代中國，甘、劉二先生均為治學嚴謹、博學厚思的學者。他們的寫作極大地影響了當代中國思想界，並分別得到許多年輕學人的追隨，我自己就從他們的著述中獲益良多。〈重新閱讀西方〉一文，是兩人聯手為

一套由他們主編的「西學源流」叢書所撰寫的總序，該叢書將自2006年2月起由三聯書店陸續刊行。這個翻譯出版項目無疑是一項善舉，我深信二位先生選書的眼光與對翻譯質量的嚴苛監督，並由衷期待這套叢書在當代中國思想界留下深遠影響。

在為叢書所撰寫的這篇總序中，甘、劉二先生聲言：近百年來中國人對西方的閱讀，因為帶有着「病態心理」，故此皆為不「健康」的閱讀；近世以來那代代中國學人，於是也皆非「健康閱讀者」。作者號召「重新閱讀西方」，並要求「新世紀的新一代中國學人」——「要端正心態，首先確立自我，以一個健康人的心態和健康人的頭腦去閱讀西方」<sup>①</sup>。

兩位前輩學者這番大而化之的「宏大」宣稱，卻讓人不自覺地體味到今日「博客」時代所一再遭逢到的那一股特徵化的輕狂——那種網絡「狂客」們的經典式口氣。

甘陽、劉小楓〈重新閱讀西方〉一文聲言：近百年來中國人對西方的閱讀，因為帶有着「病態心理」，故此皆為不「健康」的閱讀；近世以來那代代中國學人，於是也皆非「健康閱讀者」。作者號召「重新閱讀西方」。兩位學者的「宏大」宣稱，卻讓人不自覺地體味到今日「博客」時代所一再遭逢到的那種網絡「狂客」們的經典式口氣。

## 二 「歪視」：從「西洋偽書」到「中國盛世」

今天的這類「狂客」寫作，其背後所隱藏的論述邏輯便是：以貶低乃至一筆勾銷其他所有對抗性論述的方式，來確立自己論述的真理地位。甘、劉二先生「重新閱讀西方」這一論述背後的隱秘邏輯（其實並不如何「隱秘」）便是：近百年來中國人對西方的所有閱讀都讀錯讀歪了，皆非「健康的閱讀」，而現在作者所推薦的這一閱讀方式，方是真正的康莊正道，指明了「健康閱讀西方的方式」。正是在這裏，兩位作者以缺失具體分析、大而化之的方式一筆抹銷前人在「閱讀西方」<sup>②</sup>上的種種話語，並以此確立自己閱讀方式的真理地位，以及「重新閱讀西方」的正當性。

然而，即使甘、劉二位當代中國哲人對西方的閱讀確實深有洞見，此處的關鍵癥結恰恰在於——包括哲人在內的「說話的主體」（speaking subjects）在言說真理上的根本性「無能」：任何寫作與閱讀，都是以語言（甚至多種語言）作為媒介的行動，均不得經受那套用以表徵真實／真理的符號系統的滑動游移、不得不承受由其所產生的諸種幽靈性的過剩的扭曲影像。正因此，對文本的闡釋便永遠是開放的、對抗性的，閱讀的路徑便總是多元性的<sup>③</sup>。如果胡適博士等從西方「帶回來的」被隱指為「西洋偽書」、「西洋偽史」的話，那麼，憑甚麼說甘、劉二先生此次對西方的「重新閱讀」，便是「以健康人的心態和健康人的頭腦」所進行的「不偽」的閱讀？

每一種閱讀，都無可避免地是一

種帶着閱讀者自身之視角（前理解、知識背景、問題意識，等等）的「歪視」（looking awry）；更何況，此處的對象文本是作為他者的「西方」<sup>④</sup>。甘、劉二先生又如何來保證，他們的閱讀「是按西方本身的脈絡去閱讀西方」，而不僅僅是甘陽眼中（歪視中）的「西方」、劉小楓眼中（歪視中）的「西方」？僅以劉小楓最近的「盛世要修典」之論<sup>⑤</sup>為例，在閱讀當代中國之現實上，相信許多學者就會與劉小楓截然不同，那麼試問其中誰是在「按中國本身的脈絡去閱讀中國」？難道犬儒地——「政治正確性」地——將當代中國的現實解讀為「盛世」，便是「不偽」的「健康閱讀中國的方式」？當代中國學者閱讀眼下的當代中國，尚且呈現如此格格不入的對抗性，更遑論「閱讀西方」了！

## 三 「太陽底下」無法想像的全新開端

在「閱讀西方」上，甘、劉二先生在文中將當代西方學界晚近的諸種思想話語稱作為「當代西方學院內的種種新潮異說」，並要求「對西方學院內虛張聲勢的所謂『反西方中心論』抱善意的嘲笑態度」。這種強烈「偏見化」的論斷本身，難道就是以「西方本身的脈絡去閱讀西方」了？兩位作者最後斷言——「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而我卻恰恰要追問：為甚麼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

如是看來，馬克思經典的*Thesis Eleven*（即不能僅僅滿足於去解釋，關鍵是要致力於去改變），在作者眼中（歪視中），無疑也已——與作為「新潮

每一種閱讀，都不免帶着閱讀者自身之視角。甘、劉二先生如何保證他們的閱讀「是按西方本身的脈絡去閱讀西方」，而不僅僅是二位眼中（歪視中）的「西方」？以劉小楓最近的「盛世要修典」之論為例，難道犬儒地——「政治正確性」地——將當代中國的現實解讀為「盛世」，便是「不偽」的「健康閱讀中國的方式」？

異說」的「反西方中心論」等一起——被打入了那不在「西方本身的脈絡」內的「『舊』潮異說」之列。

作為當代中國學者(並且是1980年代新啟蒙運動中的兩位主要參與者)，兩位作者對馬克思存有意識形態先見，或許不難理解。但至少，共和主義是他們所明言的應予重視的「西方本身脈絡」之內的政治哲學源流。那麼，阿倫特(Hannah Arendt)——這位共和主義政治理論在二十世紀復興的主要中興者——的全部教導，便是「積極生活」，即以自由的行動，去開創在當下意識形態坐標內完全無法想像的全新的開端(beginning)。在阿倫特這裏，自由是一種能力「去開始全新的事物，……關於這一全新事物之各種結果無法被控制甚或被預測」。真正的自由永遠包含一個「無的深淵」(abyss of nothingness)，「這個深淵在任何行為之前便開啟了，它無法被一個可靠的因果鏈所說明，用亞里士多德主義的潛在性與實在性之範疇也無法解釋。」<sup>⑥</sup>

在這意義上，兩位作者把「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這句「常言」當作不證自明的「公理」來使用——即徹底預先封閉(foreclose)以自由的行動去積極開創激進溢出既有意識形態坐標(「太陽底下」)的空間，恰恰表明了：作者深深接受了「西方本身脈絡」中最保守的一支政治哲學(非但容不得馬克思、且容不下阿倫特)，並把它作為「重新閱讀西方」的「前理解」。這般一口認定「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地「重新閱讀西方」、武斷自大地摒除「當代西方學院內的種種新潮異說」，不恰恰正是——用作者自己的「狂客」語氣——十足的「病態心理」？！

故此，甘、劉二先生對「新世紀的新一代中國學人」的這一要求(即，不能以中國的視野來「閱讀西方」，而要以「西方本身的脈絡去閱讀西方」)，在我看來本身乃是一個不可能的要求：即使「西方人」自身，便會對於甚麼是「西方本身的脈絡」而分歧不休、產生出種種對抗性的論述——當代「施特勞斯(Leo Strauss)學派」和以波考克(J. G. A. Pocock)、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為代表的「劍橋學派」對西方政治思想史脈絡的對抗性解讀，便是此中的典型一例。甘、劉兩位中國哲人從西方政治哲學最保守的一脈出發，充滿「價值判斷」色彩地品評界說「當代西方種種新潮異說」、「虛張聲勢的所謂『反西方中心論』」，並規範性地斷言「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等等，若僅僅作為甘、劉二氏一己的「閱讀西方」，自是可成一家之言，並值得認真對待；但若就此聲言唯這種閱讀才是「健康閱讀西方的方式」、才是「按西方本身的脈絡去閱讀西方」，那難道不恰恰正是一種最粗暴最無畏的「狂客」話語麼？！

#### 四 用「中國的視野」去讀「西方本身的脈絡」，何如？

甘、劉二先生在文中所提出的近百年來中國人「閱讀西方」中的「真正病灶」——即那種以中國為核心的實用主義傾向(「這種閱讀方式首先把中國當成病灶，而把西方則當成了藥舖，閱讀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羅專治中國病的藥方藥丸……」)，儘管本身也並非新的洞見，但在我看來，這一

甘、劉兩位從西方政治哲學最保守的一脈出發，充滿「價值判斷」色彩地品評界說「當代西方種種新潮異說」，若僅僅作為甘、劉二氏一己的「閱讀西方」，自是可成一家之言。即使「西方人」也會對於甚麼是「西方本身的脈絡」而分歧不休，當代「施特勞斯學派」和以波考克、斯金納為代表的「劍橋學派」對西方政治思想史脈絡的對抗性解讀，便是此中的典型一例。

論述確是批判性地捕捉到了至今仍在中國學人中廣為盛行的「閱讀西方」的一種前反思的「慣習」。這樣的警示，我深深以為：愈多愈好。然而，即使作者批評的內容是「正確的」——提出警示；但他們批評的路徑本身卻是「出錯的」——即以自命真理（「健康閱讀者」、「不偽」的「健康閱讀西方的方式」）的方式取消所有對抗性論述。

有意思的是，儘管甘、劉二先生強調不能以中國的視野來「閱讀西方」，而要以「西方本身的脈絡去閱讀西方」，然而在同一時期發表的另一篇同樣由他們聯名寫作的〈政治哲學的興起〉（該文是作者為自2005年11月起由華夏出版社陸續刊行的「政治哲學文庫」叢書所寫的總序）中，兩位作者卻寫道⑦：

對中國學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能夠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自主性，戒絕盲目地跟風趕時髦的習氣。有必要說明，本文庫兩位主編雖然近年來都曾着重論述過施特勞斯學派的政治哲學，但我們決無意主張對西方政治哲學的研究應該簡單化地遵循施特勞斯派的路向。無論對施特勞斯學派，還是對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共和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等，我們都主張從中國的視野出發進行深入的分析 and 批判地討論。……中國學人不應該成為任何一派的簡單信徒，而是要以中國學術共同體為依託而樹立對西方古典、現代、後現代的總體性批判視野。

若不是兩篇文本的字字確鑿，真難以置信兩種截然對抗的觀點，竟同

一時期並排地出自相同作者之筆下。那些追隨甘、劉二先生的年輕學人們，除去「兩個凡是」的「簡單信徒」外，我想一定會被徹底搞糊塗：究竟是從「西方本身的脈絡去閱讀西方」，還是從「中國的視野」、「以中國學術共同體為依託」來閱讀西方？到底是要以西方本身脈絡來「重新閱讀西方」，還是再須要以中國的視野——「對西方古典、現代、後現代的總體性批判視野」——出發「重新—重新閱讀西方」？於是，在這一「(N次)重新來過」的「狂客」話語中，作者在前一文本裏所試圖一筆勾銷的對抗性論述，首先便恰恰是後一文本中的自己。

這便使我們重新遭遇到了「矛盾」之最初的定義性的 (defining) 那個笑話：《韓非子》中所記載的那位欲售出自己的矛與盾的楚人，前一句聲言「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前一篇文本聲言必須「是按西方本身的脈絡去閱讀西方」）；後一句則聲稱「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同一作者的後一文本則稱必須「從中國的視野出發進行深入的分析 and 批判地討論」）。兩種對抗性論述各自之「尖」之「利」，均被作者佔去。那麼，對此最好的回應方式，古人已為我們點明——「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⑧即，用作者所要求的「中國的視野」去讀作者所要求的「西方本身的脈絡」，何如？

這，在我看來，正是甘、劉二先生之論說的內在的根本性僵局：當他們號召「重新閱讀西方」、召喚「政治哲學的興起」時，他們命定永遠一已經 (always-already) 是在用「中國的視野」去讀「西方本身的脈絡」。

儘管甘、劉二先生強調要以「西方本身的脈絡去閱讀西方」，但他們在另一篇文章〈政治哲學的興起〉中，卻說中國學人應從「中國的視野」、「以中國學術共同體為依託」來閱讀西方。在我看來，這正是甘、劉二先生之論說的內在的根本性僵局：當他們號召「重新閱讀西方」、召喚「政治哲學的興起」時，他們命定永遠一已經是在用「中國的視野」去讀「西方本身的脈絡」。

## 五 結語：自我反思性的 批判實踐

甘、劉二先生的文本，使我不得不去對當下瀰漫性的那種動輒宣布「多少年來前人閱讀皆錯、現在需要重新來過」的「狂客」話語，作出一個批判性的分析與反思。

因任何閱讀都無可避免地是一種「歪視」，二位先生關於近百年來中國人對西方的閱讀皆非健康閱讀（都是讀錯讀歪）之論斷，本身恰恰是沒有問題的：那已有的對「西方」的所有閱讀，在闡釋學和存在論的層面上，永遠一已經是歪讀誤讀。然而，「近世國人閱讀西方皆非健康閱讀」這樣的說法，對我而言，首先便必須是自我反思性的（self-reflexive），即首先是自反性地指向自身，以使自己時刻警醒自身閱讀與寫作中的諸種局限、進而反思那根本性地框束自身視界的符號性坐標；而非使之僅僅成為一句用來自抬身份、確立己說之（偽）真理性的「狂客」口號。

甘陽老師、劉小楓老師，您可同意麼？

### 註釋

- ① 甘陽、劉小楓：〈重新閱讀西方〉，「世紀中國」（[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980](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980)，2006年5月16日訪問）。以下對甘、劉二先生的諸段引文，若無另外註明，皆出自該出處。
- ② 之所以對「閱讀西方」打上引號，是因為我對「西方」這個符號性框架，本身保持有批判性距離。本文對它的帶着引號的使用，是為了分析的進行與展開，而暫且沿用原

作者的論述框架。同時要說明的是，在後文的論述中，為行文表達上的要求，有若干處省去了引號。那是因為：那些地方若加上引號，會「符號性地」平增出對甘、劉二先生之論述的譏諷之意（從而便可能致使這篇商榷性文章本身被閱讀的方式，極大地遭到扭曲）。這種對行文的表達與修辭的關注，正是當代「話語分析」所傳達的一個重要教導（參見吳冠軍：〈話語分析與當代中國思想狀況——一個思想札記〉，載陶東風編：《文化研究》，第五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③ 詳細的分析請參見吳冠軍：〈一把插向心臟的刀——論意識形態批判之（不）可能〉，《開放時代》，2006年第2期，以及吳冠軍：〈話語分析與當代中國思想狀況〉。

④ “Looking awry”一語，借自於齊澤克。參見Slavoj Žižek,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91)。

⑤ 雷天：〈劉小楓：盛世要修典〉，《國際先驅導報》（參見「新華網」轉載，[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5-12/29/content\\_3984640.htm](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5-12/29/content_3984640.htm)，2006年5月16日訪問）。

⑥ Hannah Arendt, “What Is Freedom?”,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8), 165, 151.

⑦ 甘陽、劉小楓：〈政治哲學的興起〉，「世紀中國」（[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979](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979)，2006年5月16日訪問）。該文與〈重新閱讀西方〉同日起刊載於「世紀中國」。

⑧ 見《韓非子·難一》。

因任何閱讀都無可避免地是一種「歪視」，二位先生關於近百年來中國人對西方的閱讀皆非健康閱讀之論斷，本身恰恰是沒有問題的。然而，「近世國人閱讀西方皆非健康閱讀」這樣的說法，首先便必須是自我反思性的，以使自己時刻警醒自身閱讀與寫作中的諸種局限、進而反思那根本性地框束自身視界的符號性坐標。